

汉代思想史

金春峰◎著



社
·
科
·
学
·
术
·
文
·
库

金春峰 ● 著

汉代思想史

● 修订增补版



社
科
学
学
术
文
库

(京) 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代思想史/金春峰著. —2 版.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4 (1997. 12 修订版)

(社科文库)

ISBN 7-5004-2053-6

I. 汉… II. 金… III. 思想史-中国-汉代 IV. B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5413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修订第 2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1 插页: 2

字数: 550 千字 印数: 6501—11500 册

定价: 28.00 元

内容提要

本书不沿袭唯物、唯心斗争的框架模式，不囿于时下好些讲汉代哲学思想论著的传统观点，鲜明而尖锐地提出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唯心论的积极作用及局限、自然哲学提出的『有机体是信息』与欧洲哲学的『人是机器』的优劣短长以及经学兴盛与衰落的原因、经验思维与理论思维的交错上升等等。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突破与创新，在众多的同类著作中，堪称一家之言。

出版说明

以出版哲学社会科学各类学术著作为主的本社，自1978年6月成立以来，沐浴着“实事求是”与“思想解放”的时代春风，伴随着日显生机和日益活跃的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十数年来出版了大量的各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著作，积累了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高层次学术图书。为使其中具有精品性质的图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发挥更大的效用，我们从中遴选出若干种组编为“社科学术文库”。

“社科学术文库”从本社已出或即出的各类社会科学研究著作中拔优选萃，选收那些在各个学科领域里选题重大、研究深入、见解扎实和学风严谨的专著性著作；作者老、中、青兼顾，重名家名作，亦重新人力作。

“社科学术文库”将陆续出版，每年若干种。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修订增补版序

1990年，来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访问，1991年，接到剑桥一位学者来信，他正在研究中国汉代思想，要求寄赠或代买拙著《汉代思想史》，说是一位台湾教授向他推荐的。1994年又接到老同学高宣扬教授来信，说在东吴大学兼课讲汉代思想史的一位教授告诉他，讲课时采用的教材是我的《汉代思想史》。1995年上半年，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李增教授来普大访问，他说暑假将为辅仁大学汉代思想史博士班讲课，决定采用我的《汉代思想史》作教材，向我索要两本。一本我请他审阅，提出宝贵的指导意见。一本他说供学生复印、阅读。这边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系主任彼得森先生也推荐这本著作给他的一位研究汉代文化思想的博士研究生作为参考书阅读。想到这本著作能为青年学生的成长贡献一点绵薄之力，内心十分欣慰，也得到了最大的鞭策和鼓励的力量。所以我就把它修订重版了。

全书基本上保持原样，但增加了两章，一是孟喜京房的易学，一是刘歆与西汉正统经学的结局。后一章主要讨论刘歆的经学思想，也提到了《周官》。《周官》在王莽当政时，成为显学，引起人们重视；亦与学界所谓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斗争直接相关。本章的内容，除论述《周官》成书的时代，亦对汉代是否有今古文两学派的对立与西汉经学的政治化所导致的恶果，作了论述。这对于了解西汉末年思想的趋向是有意义的。关于孟喜京房易学的

基本内容，过去已出版的著作，特别是朱伯崑先生的《易学哲学史》，有详尽论述。我增写的孟京易学这一章，参阅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主要是补充和提出了我的一些新的看法，即：孟喜易学是董仲舒阴阳五行思想在易学中的推广与运用，因而是西汉董仲舒建立的今文经学之阴阳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京房易学是在孟喜易的基础上建立的，其基本贡献是在使全部“周易”包括卦的排列及每卦卦义的解释都以阴阳二气的矛盾运动为基础，予以统一的解释，从而使全部“周易”阴阳化，突显了“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易”的基本主题。飞伏、互体、卦变这几种阴阳互变以解释“易”的义理的方法的提出，则为汉易的象数之学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故由于这两章的增加，西汉的思想与学术的全貌，就更为全面而完整了。

本书能够重版，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郑文林先生和黄德志女士热心推动和促进的结果。在“出版即是赔钱”的情况下，他们却仍愿意赔钱以支持本书的修订重版，这份为繁荣文化学术而尽心尽意的情感和奉献精神，对我个人是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借此重版之际，谨表达对他们和社科出版社全体同仁的衷心的感谢。

金春峰

1996年5月25日定稿

序

丁 伟 志

对于金春峰同志，我是先识其文，后识其人的。但这中间并没有多长的间隔，读过他的一篇论文之后，就急于识荆了。这大约是1980年夏秋间事。

我一向固执地认为，文章既是写给人看的，那就必须动人。不管是动之以理、以事、以情、以辞，还是以什么别的，反正要能打动人。如果把话说绝，那我是宁肯去读激人动气之作，也不愿意咀嚼那种淡而无味、过后连点渣滓都剩不下的东西。

5年前初读金春峰同志论董仲舒之作而有所感者，就是一下子被他拨动了心弦。

我于董仲舒，从无专门研究，况且大难之后，学事荒疏，在我的脑袋里，有关董仲舒的，大体上也只残存些“天不变道亦不变”、“三年不窥园”之类，对于金春峰同志的专论，何敢妄议短长。但是我毕竟作为一个读者，而有动于衷了。动，当然首先就是为他提出董仲舒思想在西汉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意义的大胆论断所动。浅薄之如我，在未对董仲舒进行独立研究之前，自然不能也不想贸然把自己划归此论的支持者或反对者的行列中去，这正像后来看到对此论持异议的论文时也不敢贸然表示赞成或反对一样。不过，我的态度也有明朗之处，那就是支持对这样性质的学术问题，进行公开的平等的讨论。当然这也算得上是一种倾向了，即倾向于不赞成禁止这种讨论。坦白地说，这几年我对于重

要的学术问题，确有唯恐天下不“争”的心情，这大约就像足球比赛的热心观众那样，绝不希望看到的仅是一支球队在没有任何对手的情况下大踢空门。

至于何以会觉得董仲舒思想在历史上是否起过积极作用的问题，是一个应当允许讨论而且值得讨论的问题，这倒是和自己积年的思虑有关。年轻时节，学习诸大师整理分析中国思想史的煌煌巨编，服膺而步履趋之。可是时日稍久，又不免对流行论述产生了不甚满足的窃念。时有所思，渐渐地积淀成疑。我的疑问在于：悠久丰满、多彩多姿的中国思想史，为什么在有些学者手上，却状若枰上棋子，黑白分明，呈现为色调简单的图象？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把历史一旦划分成或长或短的若干段落之后，在每一段落上居然准有分别统率相互对立之营垒的思想家出现，并且是那样冰炭不容而又旗鼓相当？我曾经胡思乱想：西汉东汉，幸而都算是刘汉天下，得以划成一代，倘若分成两个朝代，麻烦可就不小，王充岂不就不能和董仲舒捉对儿厮杀了吗？这当然是故作戏言，但认真地讲，我们思想史的研究中，恐怕也不能说没有人竭精殚思地为某一时代的某一营垒“发掘”与“培养”主帅的事。历史上某位在世无大作为、身后湮没无闻、学术思想又无甚建树的平庸之辈，经我们的研究者之手“提拔”起来，从而雄踞思想史上显赫地位的事例，也的确可以举出几个来。就拿学术史上的大匠巨擘来说吧，往往也会把他们的思想加以“净化”，或贬抑而诟骂，或推崇而颂歌。善则纯善，恶则纯恶，而且似乎都是禀性天成，一成不变。意识形态领域中事，本是很复杂的，抹煞内在矛盾，剔除一切“杂质”，明快固然明快了，漏洞往往也就更显露出来。赫赫之如孔子，虽曾被尊到至圣先师的地位上，不是也并没有掩盖得住其思想中固有的某些理论混杂和逻辑紊乱吗？不错，我们容或也借诸“朴素性”之衣衫、“局限性”之靴帽，对某些古人的思想稍事缀饰，以求平抑溢美过甚的调门。这

样做得好的，当然不乏其例，可是多数似乎并不太成功，常常叫人觉得像是勉强粘上了几块补丁。

人物记传，自是治史的一种方法、一种体裁，有它存在的价值和长处。对于重大思想家进行专题研究，当然也是值得称道的，无可厚非。不过，对于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即把思想作为发展过程拿来作为历史的研究这样性质的课题来说，恐怕就不是记传体所能胜任的了。所以，我每当读到中外哲学史著作时，回萦于脑际的一个问题就是：仅仅以人物为单位，去做简单化的“批”和“捧”的品评，难道能够算是研究思想史的科学方法吗？

还是在“文革”之前，我就带着诸如此类的模模糊糊的一些疑问和念头，仰望于从事思想史研究的诸师友，盼着他们的研究工作能够突破鉴定式人物述评的樊篱，把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真正变成思想史的研究。也就是说，我希望研究者们能把眼光从人物品评、排队上移开一点，转向着重研究思潮的来龙去脉、跌宕起伏。这样，当然就需要具体而深入地研究各种思想流派（不管是同时的还是不同时的）之间和各个思想流派之内的种种关系的产生，纠葛，分合，冲突，演化与消逝，具体而深入地探讨历史上各种思潮的成因、演变及其对后世思潮的影响，并且从各种角度来观察和衡量它在历史上所起的各种实际作用。经过这样一些工作，也许就能够不再囿困于那种学案式或评传式的格局中，真正写出新型的科学的中国的思想史来，从而把我国思想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高度。当然这不是一件举手投足间便可成功的事，它需要进行多次尝试，冒一些失败的风险。作为进行这样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批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敢于带头打破旧模式的“求索”志士。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金春峰同志为学的精神，和他当年写董仲舒论文时所显露的风格，是一致的。正因此，往日生机盎然的株苗，如今已长成枝叶茂密的乔木。一部《汉代思想史》终于

大功告成了。尽管它还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摆脱习惯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尽管它还包含着若干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是它在我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不失为是一次有意义的新尝试，是一次富有启发性的新探索。

惭愧的是，几年来我于汉代思潮的认识，一无长进。承命作序，愈加惶恐。将就成文，也仍如当年一样，没有资格评论此书的得失。不过聊以解嘲的是，还是像当年那样，我仍然抱着支持一家之言的态度。况且我的确为这样一部从新的角度探讨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思潮演变的著作得以问世，而欢欣雀跃。我祝贺它的诞生，更预期它的诞生能引起关于汉代思想史的更深入的研究。

1985年6月25日于北京西郊

序

李 泽 厚

金春峰同志要我为这本书写序，我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愿意写这个序。

之所以愿意，原因之一大概由于这本书对汉代思想的一些基本看法与自己的观点不约而同，大体接近。当然，也有许多不相同的地方，例如，我对《淮南子》的评价很高，老金却恰好相反：评价甚低。

大家都承认，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但几十年来对汉代思想却研究得很少。徐复观有三本《两汉思想史》的论著，大陆学人很少见到。徐书有好些可取之处。它对汉代专制政权摧残知识分子详加发掘，大书特书，证明文字狱由来已久，为前人所未道或语焉不详者；但由于这些论证似乎总有某种另外因素蕴藏其中，就不免显得片面或偏颇。特别是对汉代作为绵延数百年的统一大帝国在思想史上投影的积极方面重视太不够了——而这，毕竟是事情的主要方面。

不是吗？中华民族之有今天，10亿人口，广大疆域，共同文化……，难道不正是由汉代奠定其稳固基础的吗？物质文明是这样，精神文明方面，例如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不也是基本形成在这个时期吗？所以我不同意大多数哲学史著作对汉代主流思想低估轻视、一笔带过或横加抹杀的流行看法，便写了篇《秦汉思想简议》发表了。

但我那篇文章是一种粗线条的轮廓勾画，非常粗糙简略；虽然自己还想继续作些过细的探究，但看来如同想作别的过细研究一样，是不大可能了。如今看到春峰同志开始做我想做而未能做的工作，并且根据大量材料得出的基本结论与我相似，例如经验论的理论思维水平、阴阳五行的普遍模式、以儒家为主干的吸收过程和儒道互补等等，似足证吾道不孤，当然很高兴而愿意写这个序。

中国文史哲领域近来似乎著作不少，相当热闹；其实陈陈相因的东西仍然太多，而未开垦的荒地到处都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大概都下乡劳动过，很多人垦过荒，都知道开荒是不容易、要费大力气的。但也都知道，开荒之后，播种灌溉，就会有丰硕的收成。处女地常常特别肥沃。

于是，我盼望着秋收。在秋收时当然不应忘记这本书的开荒和春播。

我愿再一次呐喊春天，呐喊能播下各种学术种籽的希望的季节。

1985年6月

自序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思潮，是运动。它从不静止，像奔腾向前的江河，汇聚着不断发展的民族的智慧和认识成果，凝聚着哲人们的沉思和心血。它不断更换内容而又万古长新。哲学史上留下的某些先哲的遗产似乎是静止的、僵死的陈迹，但却曾经活跃着灵魂和智慧的喧嚣。哲学史研究的任务，应该是透过历史陈迹，把曾经活跃在其中的活的思想运动，它的发展和演变再现出来，让人们看到它在产生时的千姿百态和生机勃勃的力量，看到民族智慧的灿烂的光彩。

哲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主观自生的。哲学的蓬勃向前的发展，无不受着思想发展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它作为一种精神劳作的产品，既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它是自由的，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强制一个头脑把真正的思想产生出来。但是它又是不自由的，它受必然性的支配和制约。它的自由正在于和这种必然及社会前进的要求相符合。它反映这种必然性和要求，以之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良心，因此它也就是自由的。哲学史研究的任务应该是把这种自由和必然的关系解剖出来。

哲学史不能停留于说清楚一个哲学家说了什么（这是基本的），而应该进一步阐明它为什么这样说，这样说的所以然，即它深刻的认识根源和社会的根源。

哲学需要阶级分析，但决不能把它当作一个死板的模式和框

框。在整个封建社会，基本的阶级矛盾和结构，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但是矛盾的双方是在不断变化的。如汉初的强宗豪族和汉代中后期就不相同，在独尊儒术以前和独尊儒术以后就不相同。“尊儒”使豪强逐渐和经学、知识相联系，产生了“士族”。正是“士族”这种特定力量决定了汉代中后期思想领域的变化和政权组成的变化；决定了经学在永平时期享受空前的荣誉；又决定它必然和皇权发生尖锐矛盾而遭受打击，从而使皇权和士族的联盟破裂，东汉皇朝灭亡，由新的士族取而代之。停留于一般的豪族概念，就会看不清汉代政权和社会阶级的变化，就不能阐明汉代经学及其思想的发展、没落和演变。

哲学的形态表现为哲学范畴的发展和演变。每一哲学有一起主导作用的范畴，并围绕它而展开着一个体系。哲学史研究的任务，应该从繁多的范畴中，找出支配一个哲学体系的主导范畴，并找出支配整个时代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独特表现形式。在汉代，这个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基本形态是以阴阳五行为模式的天人同类、天人相与、天人相副，这是自然论与目的论的对立与相互影响。这个基本形态决定了它的认识论的经验主义与方法论的重系统和结构的特征，也决定了各种具体哲学形态的特点。所以哲学史研究和哲学一样，应该是十分丰富、多彩多姿的。如同哲学是时代精神的表现一样，好的哲学史也应该是时代精神的表现。

两汉思想过去被认为贫乏、低下，其实恰恰相反，它充满着矛盾、活力，高潮迭起。它无奇不有，雄浑、粗犷。既是先秦百家思想的汇集与综合，又是魏晋思想的温床与源头。正是经过汉人的努力，中国这统一的民族和疆域才固定下来，中国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性格才固定下来。犹如“万里长城”，汉人的建树，无论在事功和思想方面，都为中华民族打下了根基，树立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绝不会没落消失的牢固的基础。

对于汉代哲学思想，我们的态度无疑不是轻蔑而是敬佩；不是全盘否定而是一分为二的批判、继承。它是民族文化和智慧不断前进的里程碑，是祖先留下的丰富文化思想成果之一。

本书对汉代思想的研究，是在前辈和同行们的基础上所作的一点努力。心大而力薄，眼高而手低。所想和所做的，所做和所预期的，常常隔着很大的距离。但是目标既已定下，方向既已明确，就坚持着走下去。于是有这奉献于读者面前的不成熟的著作。它是一些足迹，自勉着在时代的激流中走下去，走下去的一些不断探索足迹。如果还有点什么可以肯定的话，那就是在时代精神激励下这种用以自勉的坚持求索的态度和精神。

作 者

1985年4月12日

目 录

自序.....	(1)
绪论.....	(1)
帛书《黄帝四经》的思想和时代	(18)
一、帛书《黄帝四经》和《老子》思想的关系	(19)
二、帛书关于道、天、理的思想	(20)
三、辩证法思想	(27)
四、刑德思想	(32)
五、刑名法术思想	(36)
六、黄老刑名（法）是一个思想体系	(38)
七、帛书产生的年代	(41)
汉初黄老思想的政治实质及其在学术领域的影响	(49)
一、汉初黄老思想的政治实质	(49)
二、汉初黄老思想对陆贾、贾谊的影响	(57)
三、韩婴、董仲舒思想中的黄老影响	(62)
四、黄老影响不能夸大	(67)
五、《论六家要旨》对黄老思想的赞誉.....	(71)
六、黄老思想的退位	(76)
汉初儒家思想的复起及其儒法融合的特点	(78)
一、陆贾“仁义为本”的思想	(78)
二、贾谊的礼治思想	(88)
三、贾谊对黄老无为思想的批判	(91)
四、贾谊融合儒法的思想特点	(97)